

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

姚惠娜 黄民兴

【提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巴勒斯坦 民族主义 发展阶段 特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当代中东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构建;2.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如传统政治精英、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及其冲突与斗争;3. 各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4. 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①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其转型,以及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② 但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体特点的研究不多。在以上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并从整体上探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① 参见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aruch Kimmerling & Joel S. Migdal, *Palestinian: The Making of A People*, The Free Press, 1993; Muhammad Y. 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Amos,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Pergamon Press, 1980;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rry Rubin, *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the PL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olitics of Contention, 1967 - 200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Y.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 - 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Y. Porath,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 - 1939*, Frank Cass, 1977; Ann Mosely Lesch,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 - 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 - 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els Johnson,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2。

② 参见赵克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刘中民:《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杨辉:《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 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前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19世纪后期—1920年)

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于奥斯曼帝国,它属于泛民族主义,强调西亚的阿拉伯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北非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处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因而更多地关注各自殖民地的独立),最初要求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后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土耳其化政策的压迫下,阿拉伯人开始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①当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贝鲁特省,所以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地方贵族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支持大叙利亚的统一。^②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欧洲形成。它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并于1917年获得英国的正式支持。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相当关注巴勒斯坦当地的形势。1918年,英军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占领巴勒斯坦全境,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的统治使巴勒斯坦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域和政治实体。1920年费萨尔领导的叙利亚政权垮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统一计划的失败,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因此开始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母体而形成。

2. 由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和衰落时期(1920—1947年)

1922年,英国把约旦河东岸地区划出,成立其控制的外约旦酋长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地域被局限于滨临地中海的约旦河以西地区,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更加发达。传统精英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属于崛起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城市贵族,依靠其宗教或部落领袖地位、土地、财富及与奥斯曼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当地总督与民众的中介人,他们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巴勒斯坦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中耶路撒冷的精英家族实力最强大。^③英国统治当局的扶植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家族的作用。在传统精英的领导下,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陆续建立起来。它们多以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内部充满矛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与纳沙希比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在整体上削弱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④

在英国“扶犹抑阿”政策支持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初具民族国家的雏形。阿犹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发生阿犹相互屠杀的事件。1936年至1939年,阿拉伯人掀起了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斗争,并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斗争中,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建立了早期的阿拉伯社团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这是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起源。由于内部的分裂及英国和犹太人的联合镇压,斗争最终失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解体,民族主义力量被摧毁,巴勒斯坦阿拉

①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参见黄民兴:《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西亚非洲》2001年第3期。

② 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

③ Muhammad Y. 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 218.

④ 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9—210页。

伯社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① 传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走向衰落。

3.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1947—1965年)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明显偏袒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此后巴勒斯坦陷入非正规武装冲突。1948年5月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犹太国家以色列宣告成立;10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巴勒斯坦国家建立。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国家的首次尝试,但是,由于未得到大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加之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涣散,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并未真正实现。在随后开始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外约旦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后改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分治决议中划归巴勒斯坦的其他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赖以立国的领土不复存在。大批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间,大约7万名巴勒斯坦精英逃离,^②民族主义的传统领导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入消沉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受教育的巴勒斯坦人数目的增长及对流亡巴勒斯坦人边缘地位的不满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关键性的社会力量,激进的巴勒斯坦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195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激进组织“法塔赫”^③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964年5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领导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巴解组织在成立之初,受埃及的影响很大,缺乏独立性,因此没有多少作为。但是,它毕竟成为正式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和事实上的流亡政府。

4.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及其向政治斗争过渡时期(1965—1993年)

1965年元旦,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是巴勒斯坦人自主抗击以色列的开始。1968年法塔赫取得卡拉迈大捷,从此发展为巴勒斯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抵抗组织,1969年成功接管巴解组织。主张武装斗争的巴解组织由此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成熟。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由于影响约旦的内外安全,在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中被镇压,1971年又被全部赶走,撤往黎巴嫩。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发展壮大改变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平衡,成为黎连年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在1982年被以色列彻底赶出黎巴嫩,撤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和黎巴嫩“国中之国”地位和基地的相继丧失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同以色列直接较量的可能,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继续开展反以武装斗争的条件。1973年十月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首次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和1967年的以巴边界;巴解主张在上述决议及保障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基础上,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会。^④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

5. 巴勒斯坦国家雏形:自治区建立时期(1993年至今)

1993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解组织通

①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王建、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②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第110页。

③ 阿拉伯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逆序首字母读音,法塔赫的军事组织即“暴风”突击队。

④ Yehuda Lukacs e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 Documentary Rec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19.

过谈判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出了一步。《原则宣言》及其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文件构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为巴勒斯坦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国打下基础。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实施《原则宣言》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临时自治进程,巴解组织从流亡的民族运动转变成自己领土上的政府机构,巴勒斯坦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巴以从1996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上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至2008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即阿克萨起义),和平进程事实上陷于停顿,直到今天仍未真正恢复。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相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它卷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同一块领土的生死斗争。如前所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西亚的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尤其是在大叙利亚地区。但是,英法的委任统治使阿拉伯统一的梦想成为泡影,西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委任统治地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划定了巴勒斯坦的边界,确立了一种权力结构,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此框架内,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即发展民族认同)。有学者将这种晚于国家产生的民族定义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以区别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① 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惨烈的冲突,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建国,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根植于大众,能够有效地动员流散的群众,为实现建国目标而展开武装斗争。虽然未能正式建国,但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载体的巴解组织起到了流亡政府的作用,在动员巴勒斯坦民族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进行民族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的构建,这主要体现为巴解组织的发展。

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领土和首都、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以色列的占领和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处于埃及管制下的加沙地带成为巴勒斯坦仅余的领土。1967年“六五”战争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都被以色列占领。奥斯陆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开始后,巴勒斯坦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但至今仍未划定最终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悬而未决,而且以色列至今仍不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伴随着领土的丧失,巴勒斯坦人在地域上被分割成以色列本国、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三个区域的群体;在身份上,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被占领

^①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 Enloe, "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p. 140.

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约旦公民(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并未予以并吞,仍由约旦任命官员管理)或加沙巴勒斯坦人,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或侨民,谋求建国的实际上是后两个群体。巴勒斯坦人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圣地”地位,19世纪结束以前就存在着巴勒斯坦认同的萌芽。^①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的1948年战争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经历和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即使失去了共同的家园,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显示着其民族特性,巩固和强化着民族认同。^②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仍保持了民族意识,1988年他们甚至拒不庆祝以色列“国庆”,而称其为“灾难”。^③即使流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集中性。在寄居国的种种政策限制下,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难民营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领导层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家族向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闪电)、阿拉伯解放阵线(阿解阵)、人阵(总部)、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前提下,各成员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主张,因此巴解内部的思想倾向既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左翼思想。在宗教信仰上,法塔赫领袖多属逊尼派穆斯林,人阵领袖如乔治·哈巴什和民阵领袖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均为基督徒。

巴解组织下属各派别的领导层多为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军官、政府官员等。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取得巴勒斯坦人的领导权。1967年以色列占领后,传统贵族一度重返地方政坛,但在1976年的市政选举中,被巴解组织击败。^④当选者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年轻人,2/3的人不超过50岁。^⑤80年代,被占领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贵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丧失。首先,以色列大规模没收土地,严重削弱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贵族权力。到1987年,以色列直接控制了西岸52%的土地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⑥其次,巴勒斯坦雇佣劳动力阶层壮大,农民阶层趋于消失。以色列就业市场自1968年开始向巴勒斯坦人开放,到80年代,被占领土40%的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⑦大批农民因此变成依靠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力,不再依附传统贵族,这也为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最后,被占领土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新的巴勒斯坦精英,对贵族政治产生了直接挑战。1972年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大学,只有几个小规模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几乎只有贵族精英子弟才能通过留学获得大学文凭。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大

①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p. 42 - 79.

②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 - 1993*, p. 667.

③ Ilan Pappé, "The Bridging Narrative Concept", in Robert I.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7.

④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第131页。

⑤ Glenn E.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

⑥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 - 1993*, p. 607.

⑦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 - 1993*, p. 607.

学深造,巴勒斯坦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难民营、农村、小城镇。^① 高等教育造就了新一代的民族领导层,他们主导了被占领土的地方政治。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认同,从宗教中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促进了被占领土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即是在1987年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

自阿克萨起义发生后,巴解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执政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组阁权。哈马斯的崛起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全新的成员,即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哈马斯奉行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思想完全不同于巴解组织,虽然明确宣布尊重后者,但不赞成它的世俗主义主张;^②而是宣称“《古兰经》是宪法”,^③要“重建穆斯林国家”;提出消灭以色列国家,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的瓦克夫”,任何人都不能放弃或分裂之;^④反对和谈,认为“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所有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行动、建议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⑤ 哈马斯打破了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垄断,使后者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涉及未来巴勒斯坦的领土范围、国家性质,也涉及权力分配,从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代表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另一种国家模式的出现,后者完全否定民族国家的西方模式,至少在理论上。

第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解组织在各种文件中多次宣称,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消除了所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痕迹”,^⑥“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将过着平等、友爱、公正与和平生活”。^⑦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宣称,解放巴勒斯坦后将“保护这个国家所有宗教寺院,保证人人享有礼拜与参观访问的自由,而不会因人种、肤色、语言或宗教的不同而受到歧视。”^⑧ 巴解组织各政治派别的思想和观点也是世俗的。^⑨ 人阵和民阵是巴解组织内地位仅次于法塔赫的更为激进的派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闪电和阿解阵等组织也都强调要同时开展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正因为各政治派别的世俗性,其领导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但法塔赫也赋予民族斗争以一定的宗教内涵。事实上,“法塔赫”一词即有“穆斯林通过圣战的征服”的含义。^⑩

第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巴解组织成立之初,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出路。据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透露,巴勒斯坦游击队平均每月出击以色列的次数为:1967年12次,1968年52次,1970年前8个月为279次。^⑪ 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领土或并入约旦

① Glenn E.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p. 16.

② 《哈马斯宪章》第27条。该宪章收录于耶路撒冷媒体新闻中心(JMCC)网站:<http://www.jmcc.org>。

③ 《哈马斯宪章》第8条。

④ 《哈马斯宪章》第11条。

⑤ 《哈马斯宪章》第13条。

⑥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政治声明》,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页。

⑦ 1969年7月12日阿拉法特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66—68页。

⑧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16条。载凯马尔·H. 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⑨ 关于巴解组织各派的思想,参见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

⑩ Mordechai Nisan, *Toward a New Israel: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Arab Question*, AMS Press, 1991, pp. 96—97.

⑪ 阿布·伊亚德:《不回故乡,毋宁死亡》,阎瑞松译,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1983年版,第87—88页。

或为埃及控制,后来又全部被以色列占领,而埃及和叙利亚不允许游击队从本国袭击以色列,巴解组织不得不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行动基地。同时,各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缺乏统一的决策与指挥,巴解组织只是各派别的松散联合体,没有建立与武装斗争任务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因此受到很大限制。1968年至1970年是游击队武装斗争最成功的时期,但就战斗强度和军事效果来说仍然有限。^①

尽管如此,武装斗争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国家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寄居国的抑制政策,弱化和模糊了流亡到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而武装斗争重新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1968年卡拉迈大捷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从难民、寄居国的二等公民演变为从事反以斗争的战士和革命者,这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荣誉感。武装斗争强调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自治愿望,证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独立的决心,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法塔赫尤其重视武装斗争与民族认同的直接关系,在宣传工作中给予大力强调。^②参与武装斗争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法塔赫领导人因此在1969年成功接管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民族构建的进程推动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武装斗争为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提供了主题和实践,并通过政治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军事化、提供政治合法性等为巴勒斯坦国家奠定了基础。^③这主要体现在巴解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方面。阿拉法特曾于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正是通过我们人民的武装革命,我们的政治领导成员和民族组织机构才最终得以具体化,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组织和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实现”。^④

第六,巴解组织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式代表的巴解组织本身相当于一个流亡政府,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委员会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是具有议会性质的立法机关,巴解执委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关。这些机构的职能在巴解组织1988年10月公布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明确。^⑤巴解组织还对侨居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征税。但在建立早期,巴解组织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传统精英,^⑥不能有效动员民众,没有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虽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但影响力有限。法塔赫接管后,确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吸纳众多群众组织加入,使巴解组织能够动员和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成为民众参与民族政治的渠道。

在巴解组织的庇护下,游击队组织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获得了自治权利,巴勒斯坦的基层组织和准政府机构得到发展,这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组织基础。巴解组织的地位逐渐为国际社会接受: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成为阿盟正式成员,确立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合法地位。1974年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确立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

①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 667.

②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 195-196.

③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 665.

④ 讲话全文节录收入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342—348页。

⑤ 《巴解组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127—130页。

⑥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 98-99.

表性。外交承认为巴解组织提供了更大的地区和国际舞台。根据奥斯陆协议,199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告成立。1996年巴自治区选举阿拉法特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同时88名成员组成了巴立法委员会。而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区域包括巴以共管地区在内,已占全部被占领土的40%,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经形成。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以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建国目标的进一步支持。

第七,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占领及其采取的掠夺性的经济政策,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结构失衡,被占领土农业萎缩,工业落后,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来源,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以色列。同以色列经济的紧密联系和事实上的一体化,成为巴勒斯坦经济的主要特点。现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曾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同以色列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可以说完全从属于以色列经济”。^① 这使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实际上等于是前者的殖民地。自治后,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色列仍然控制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边界和关税征收,掌握着主要的资源、能源及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加之原有基础薄弱,巴勒斯坦经济仍无法摆脱对以色列的依附。以色列转交的代征税款是巴自治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如果不算国际援助,占财政总收入的60%还多。能否按时接收到这些税款不仅决定着巴自治当局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还直接关系到自治当局本身的存在。^②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命运。

第八,巴解组织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巴解组织没有可以建立基地的领土,其主体和领导机构都依靠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栖身之所,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弱小的地位使其不得不依赖其他阿拉伯国家。而犹太人对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占领,也使阿拉伯国家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从而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的政策影响和制约了巴解组织。巴解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进攻往往招致报复性军事打击,威胁到所在国的安全,因此军事行动受到与以色列接壤的各阿拉伯国家的限制。对巴解组织最早、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埃及。1964年5月,纳赛尔通过阿盟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巴解组织,从而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运动。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有充分了解,不希望轻启战端,使地区失去战略平衡。约旦原属巴勒斯坦,后来更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解组织的影响尤其大。在约旦河西岸的主权问题和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问题上,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约旦授予西岸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使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60%。巴解组织在当地的发展壮大威胁到了约旦的国家主权和内政稳定,最终遭到镇压,不仅力量受到削弱,其武装斗争也完全依赖在黎巴嫩的基地。由于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的影响。伊拉克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对巴解组织也拥有重要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慷慨援助是巴解组织的重要财政来源。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闪电和阿解阵的分别支持是巴解组织内部分歧的原因之一。耶路

① 马哈茂德·阿巴斯:《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② 参见姚惠娜编著:《巴勒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撒冷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崇高的圣地地位,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关注和影响着巴解组织对耶路撒冷的政策。围绕着作为约旦河西岸一部分的耶路撒冷的权益,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存在着冲突。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两国对巴解组织的影响最大。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争中的惨败使英、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势力急剧下降。苏联由于在战争期间“有力而果断的干涉”,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巨大声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而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1956年12月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它公开宣称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是“国际共产主义”。中东从此进入了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时代。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自居,尤其是在与埃及关系破裂后,加强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从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经历了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分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取得阿以冲突历次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只是在1977年卡特出任总统后,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才发生明显变化,积极促使巴以和谈。在冷战结束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也起着主导作用,只有美国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从而使阿以和谈产生结果。但是美国一贯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在和谈中处于不利地位。2000年以来,美国全力投入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巴以冲突的参与及对以色列的压力,这成为巴以冲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范围内逐步形成,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土地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领土被占领,民众被迫流亡,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由于无法胜任反抗委任统治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任务,传统精英对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新兴的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取代。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将世俗国家和政治主权的思想与大众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加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的国家构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巴解组织就是巴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美国偏向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主义潮流中一种相当特殊的类型,其罕有经历不但反映了本地区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而且反映了当代大国政治的复杂性。

(作者姚惠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邮编:710069)

(责任编辑:刘军)

(责任校对:董欣洁)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Meanwhile, the academic circles pay attention to the abuse of argument from silence consciously, which would more embody the academic idea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ing every word accurate and reasonable in Western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extolog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will still have the effect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 the inestimable value to follow the method of the applicable limits of argument from silence in the ancient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Yao Huina, Huang Minxing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is a state nationalism with the goal to build a Palestinian nation-state.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the Palestinian nation-state was lost and a unique Palestinian nation containing the native and the Diaspora group was formed for the Palestinian failure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Zionism for the land. The composition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ts is diverse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ts is secular nationalism.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ts advocated armed struggle, and in the course of armed struggle, the Palestinian nation 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were initially realized. The PLO is the prototype of the nation-state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state-building has been seriously hindered by the lack of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base, and impacted and limi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wers.

Re-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ate Origins, Blood,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Chao Tianyi

According to Morgan's opinion, the origin of state is on the premise that blood factors are weakened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are strengthened, and the state will be finally established based on foundation of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emerging of anthropological survey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scholars found many cases that indicate the state may b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kinship organization. This means the traditional views should be reconsidered. Specifically,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and kinship organization coexis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played very important functions together in prehistoric time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prehistoric society to the state society,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s may grow into a political group. Whether a state is based on the ground of kinship organization or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depends on which factor get dominated development on the eve of the nation's com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American Identity//Chao Longqi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Chinese-American identity has gone mainly through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ostility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efly identified to their homeland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